

打过长江去

(一)

淮海战役后,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七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华、副军长詹化雨、副政委邓少东、参谋长熊应堂。二十五军辖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第七十三师成立时的军政主官:师长王培臣,政委肖学林,副师长吴怀才,政治部主任王荣光。当时,二十五军是三野的主力军,七十三师又是二十五军的主力师。

七十三师师长王培臣,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智勇双全,善打能战,曾闻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人说,王培臣是后来电视连续剧《亮剑》中八路军师长的原型之一。

1949年4月,雷伟和在王培臣的七十三师任参谋长。自1944年以来的6年中,雷伟和在战斗中不断成长、进步,由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到师参谋长,一年一个台阶。

这时的七十三师(原七纵十九师),下辖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三个团,配齐干部,充实队伍,老弱病残复员2000多人,补充5000多人,其中从解放区来的新兵2000人,根据“随俘随补、随敌随战”的精神补充“解放战士”3000人。抽调一批班、排、连干部到军教导队学习,为进军江南做好准备。

(二)

4月1日,七十三师部队到达含山县南部铜城闸地区,做渡江准备工作。部队立即组织干部到长江边二坝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并抽调一部分兵力挖掘沟河、水道,做好民船翻坝工作。同时,筹集民船,动员船工,根据“随俘随补、随敌随战”的精神补充“解放战士”3000人。抽调一批班、排、连干部到军教导队学习,为进军江南做好准备。

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何况敌人在南岸挖了战壕,筑了暗堡,拉上了铁丝网,水际滩头布满了木桩、鹿砦等障碍物,工事修得十分坚固,又有重兵把守,而且,上空有敌机,江中有敌人的军舰、炮艇,咱们凭着小小的木船,行吗?这是不少船工的疑虑。于是,部队重视对船工开展思想工作。那些天,军、师、团的各级首长吃不下、睡不着,多次来到江岸,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反复勘察,同干部、战士和船工们多次研究,发扬民主,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广泛听取部队和群众的意见。

六安与上海的革命情缘

回首建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六安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中,见证了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结下了坚固的革命情缘。

马克思主义从上海传播到六安。1918年夏,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君曼与丈夫陈独秀回籍探亲,给家乡青年带回一些进步书刊。他们应邀在霍邱城关讲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革新教育和政治。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无疑是一次空前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皖西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霍山籍学生储承之、汪与之参加五四示威游行之后,被派往上海进行宣传活动,在日租界被日本军警开枪杀害。6月,消息传来,激起霍山全县人民的极大愤怒。霍山人民在城关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宣读了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悼词,发表了声援五四运动的宣言。对遍及皖西的这场大规模学生运动,刘希平、沈子修、朱蕴山、洪世奇等人积极给予支持。

1922年底,寿县的李坦(李荣桂)从上海回到家乡高刘集李家洼子,于次年初中在家中办起改良私塾,招收了二三十名青年学生,不读子曰诗云,而是传授科学知识,宣传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皖西迅速广泛的传播,促进了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响应五四运动而连续开展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革命骨干,皖西党组织也自此萌芽。

皖西在五卅时期涌现出来的骨干,如蒋光慈、许继慎等人大多都在上海学习过,在上海接受革命洗礼。皖西青年在上海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开展党的工作。1907年,寿县人高语罕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安庆、芜湖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0年,高语罕经李大钊和张中府介绍,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高语罕曾在“中央直属的上海的党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后在陈独秀指示下到安徽学生界开展工作,是陈独秀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中的“最先响应的人”,也是陈独秀“筹划在各地组织共产党小组”的安庆联系人。在高语罕的教育与指导下,在安庆读书的霍山学生舒传贤于1921年10月“在安庆开始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负团的责任,时又充任全省学生联合会会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皖西在外地的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加入外地的组织。寿县的毕仲翰于1922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春,曹蕴真在上海经陈统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徐梦周于1922年入党,不久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鲁平阶于1922年在上海经陈统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1月22日,在上海大学读书的薛卓汉、徐梦周、王逸常被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入党。不久,朱松年、徐德福、方曙霞、胡允恭(胡萍舟)、陶准等也在上海大学入党。

此外,霍邱县白塔墩(今属金寨县)的蒋光慈于1922年在苏俄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7月蒋光慈回国,经瞿秋白介绍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创办太阳社,主编《拓荒者》,著有《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等非常有影响力的革命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拓荒者。

从上海等地回来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皖西党组织。皖西在外青年中党员、团员的出现,为皖西地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提供了条件。因此,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2年春皖西就建立了党的组织。

皖西建党是从建团开始,而建团又是从旅外青年学生中开始。在安庆、芜湖建团的同时,寿县在外地入团的青年学生为骨干,于1922年春成立小甸集S. Y. (英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缩写)特别支部,书记曹蕴真,团员有徐梦周、鲁平阶、胡宏让等,直属团临时中央局领导(5月改属团中央领导)。团特支以小甸集小学为活动中

丁美科 王桂红

六安与上海的「缘分」(中)

心,在师生和农民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团特支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至1923年夏有团员6人。

皖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成立,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在此期间,皖西各地的党组织也开始筹建。1922年春,寿县小甸集在建团的同时,“就有二、三同志的组织,当时是党的婴儿时候”[(寿县县志)《1929年5月9日》,中央档案馆、安徽档案馆藏《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四册上,1987年,第218页]。这“二、三同志”正是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成立了中共寿县小甸集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组长曹蕴真。

中共六安特别支部是六安最早的党组织,在它的领导和发动下,六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25年冬,中共党员王绍虞受中共上海大学支部派遣回六安,组建党组织。王绍虞回到六安后,先后同芜湖、杭州、上海等地回来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王立权、吴曙光、刘大蒙、田崇厚、蔡蕴真、毛正初等取得联系,在城关建立了中共六安特别支部,书记王绍虞,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皖西武装暴动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指导密不可分。1927年8月起,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根据安徽省临委安排,六安籍共产党员许继慎、储克圣、吴干才、桂伯英、毛正初等,先后从上海、武汉、安庆和芜湖等地返回家乡,同本地共产党员周菊之、罗亨信等一起,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10月,省临委决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五个县为安徽第一暴动区,要求六安特区委立即组织农民暴动。1927年10月、1928年7月,省临委两次指令六安党组织举行武装暴动。六安特区委和后来的六安县委根据主客观情况,认为暴动条件尚未成熟,提出延期举行暴动的建议。为此,六安特委书记胡苏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省临委和六安县委组织的意见分歧,于是报请中央决断。

1929年3月1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到会的有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六安县委书记王逸常和熟悉六安情况的许继慎、柯庆施。周恩来对六安党组织延期暴动的意见给予肯定,并提出抓紧做好暴动准备的要求。六安党组织抵制“左”倾冒险斗争,使革命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上海会议后,六安党组织进一步加快武装暴动准备工作的进程。1929年8月,中央巡视员方英在六安、霍山边界豪猪岭主持召开六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六安三区独山、郝家集、西河口等农协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举行秋收起义,拉开了六安起义的序幕。1929年11月8日,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了著名的独山暴动,接着又发动了霍山独山、桃源河、六安古碑冲、七邻湾农民起义和徐家集团练起义等数十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组建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1930年1月20日,六安中心县委决定把六安起义中的三支游击队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全师共有200多人。六安中心县委在组建主力军的同时,大力加强地方群众武装的建设,在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游击队。在六安中心县委积极领导下,主力红军英勇作战,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到1930年4月,六安起义的烽火燃遍了皖西大地,在六安、霍邱、英山、潜山、舒城相毗连的地区,初步创建了东起溧河、西接商南,南抵金家铺、水吼岭,北至白塔墩、丁家集,南北200多里,东西100多里,人口40多万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并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安与上海的革命情缘可谓源源不断。抗日战争时期,鄂豫皖皖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上海人民的支持,上海文化界内地服服务团等抗敌团体在六安活动频繁,有力支持了六安人民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解放战争新局面,六安籍指战员参与解放大上海;如:开国将军陶勇、林维先等参与上海战役与上海解放后的反特保卫工作。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9372@qq.com

指挥所里,军长成钧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今晚不睡觉,等待渡江胜利的捷报。”成钧热血沸腾,急忙将电话内容转告各师。

当晚10时,强渡长江开始了!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担任左翼第一梯队的突击任务,船至江心,师炮兵群对南岸之敌猛烈射炮,粉碎敌人的抵抗,又掩护渡江第一梯队突破敌人江防。仅半个多小时,七十三师第一梯队两个团到达对岸,发射登岸成功的信号,长江南岸顿时一片火海,战斗异常激烈。

正当七十三师大部分船已渡过江心时,从上游驶来4艘敌舰猛冲而过,还用机关炮向渡江船只扫射,师参谋长雷伟和打电话令野炮连:“快把敌舰干掉!”敌舰在炮击下慌忙逃窜。

此后,王培臣师长及师指挥所人员也乘船渡江,于21日凌晨2时到达南岸。凌晨4时,全师三个团都已过江登岸,迅速夺取敌人的滩头阵地,很快将红旗插上长江南岸,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紧接着,七十三师一鼓作气,占领了三山街要地,会同全师发起了“湾沚战斗”。

先说三山战斗。这是渡江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芜湖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激烈作战。早在渡江之前,三野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王培臣就曾化装成士兵,同侦察连一起过江侦察了三山街要地。4月21日凌晨,七十三师指挥所到达长江南岸姜家墩,命令二一七团渡过三山街边小河,迂回到三山街东南,并拟二一九团在北,二一八团在西,三面会攻三山街。

上午,二一七、二一八团先后两次攻打三山未果。后据俘虏供称:当天拂晓,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及二十军一三四师师长李介立率领3个团的兵力到达三山,这时三山敌军已有4个团的兵力防守了。三山街守敌设置了地雷、陷坑、铁丝网等障碍,妄图凭借坚固的工事和火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抗。

七十三师指挥所命令作战科将上述情况迅速报告军部。军首长指示,七十三师迅速过河从

南边围攻三山街。21日下午,七十三师全部过河至三山街西面、南面和东南面。22日上午,副军长成钧率雨来到七十三师,具体部署攻打三山街。经过两天激战,三山街道得以解放。

在“三山战斗”的同时,三野二十五军还发起了“湾沚战斗”。湾沚镇,处于芜湖城南90公里外的公路边(当时隶属宣城县)。军长成钧命令七十四师为右纵队,七十五师为左纵队,他亲自率领七十三师参战,对湾沚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4月24日下午,在方圆三五里的一片山洼里,全歼敌二十军,歼敌2万余人(其中俘敌13000余人)。敌二十军中将军长杨才干,穿着士兵的衣服,混在队伍里逃跑时被子弹击中毙命(也有说在突围无望时杨才干拔枪自杀)。

我军的战斗,常常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湾沚战斗,则是一军对一军,三野二十五军对敌二十军。敌二十军在刚刚结束的渡江战役中并未受损,是一个完整的建制军,而且这个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湾沚战斗结束后,三野司令部给二十五军颁发嘉奖令,称湾沚这一仗首创“一个歼敌一个军”的光辉范例。

自4月24日开始,部队进入渡江作战第二阶段,展开对敌追歼战,穷追猛打南岸纵深之敌。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连续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队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勇猛追歼逃敌。至29日,七十三师各团已追敌至溧阳、广德、宜兴、长兴等地,并占领这些县城,奉命清剿这个地区的残敌散兵。一周后,基本肃清。

整个渡江战役中,仅七十三师就歼敌6000余人,俘虏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自己伤亡2100余人。

(四)

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解放上海,二十五军又建功,是攻占大上海的10个军30个师的主力军之一。5月25日午夜3时开始,二十五军强攻穿插,与二十九军一起攻打宝山、吴淞,于26日上午8时共同占领吴淞口,俘敌8000余人。占领吴淞口,控制了江岸要塞阵地,切断了国民党军的水面交通退路,留在市区的敌人便统统走进了我军第九、第十兵团的口袋。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淞沪战斗刚刚结束,二十五军又接到上级命令:攻占崇明

岛。进攻部队采取兵临城下、逼敌投降的策略,迫使约5000守敌放弃抵抗,6月2日缴械投降,崇明岛解放。

(五)

1949年7月底,二十五军接到进入浙江剿匪的命令,军长成钧、政委詹化雨指挥部队,用远距离奔袭、分进合击、多层设伏、四面包围的战法,撒大网、抓大鱼。到12月间,大山区的匪徒被歼灭,共毙、伤、俘土匪7300余人,其中,匪首“中将司令”国民党被击毙,“上海清剿总司令”赵耀清被活捉,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

当时,雷伟和所在的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进军浙江,安徽交界的天目山,参加天目山剿匪斗争。

天目山,风景优美,山势陡峭。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土匪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经常出没的地方。新中国成立时,天目山一带聚集了来自全国12个省、25个县的千余名土匪,是当时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股匪有:以吕国华、张云鹏为首的“国民党护军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800多人;以李去非为首的“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富春江游击纵队第七支队”100多人。各县的伪自卫大队,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时,慑于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不得不伪装投诚归顺,而在解放军主力部队离境南下后,又重新纠集在一起,有的如潜伏的吕国华把队伍拉到山里,有的继续伪装,开展猖狂破坏活动,并发动武装暴乱。天目山匪特别猖狂暴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威胁新生人民政权,引起群众的极度恐慌。

七十三师于8月份开赴天目山,与当地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军民合作,通过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很快打开了局面。至10月,匪患最为严重的临安、於潜、昌化三县共歼灭土匪15股、890人,缴获各类枪支325支及大批弹药,土匪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擒获,股匪(或股土匪)基本肃灭。

自渡江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及上海、武汉等城市,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和江西、湖北、福建等省一部分,为解放全华东及向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条件。从渡江战役到剿匪天目山,是雷伟和参与“打过长江去”的主要经历。(张正耀 编著)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二十二

百年沧桑李家圩

刘瑞明/文 唐书俊/图

某个秋日,夕阳西下,昏鸦回巢。一行人风尘仆仆,来到霍邱西乡李家圩子。他们似乎和普通游客有所不同,其中好像有人来过,对他们的随行人员低声介绍着。他们仔细参观仅存几十间翻修过的房子,其它大部分只有遗址了。在废墟上驻足良久,似乎在努力追寻当年的时光——

李家圩,庄穆而神秘,李氏家族,庞大而复杂。此前,霍邱文化学者柳冬妮先生所著《一个被斩首民众的“诗人”》一文,以事实为依据,对清后期李家圩及李氏家族成员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评判,打破了那个特殊年代里过于左倾的桎梏,开启了新的篇章。

在霍邱,可谓“东西两座李家圩,半部晚清民国史”。如今,对于霍邱本土历史文化的研究,李家圩仍然是必须面对而又绕不开的课题。在此,笔者结合正史及野史中的残缺信息,再次简单梳理一下李家圩的陈年旧事。



李家圩建筑艺术的鸟瞰图



据公元1992年版《霍邱县志》记载,李家圩(李西圩)坐落于本县马店镇西约3公里处,是全国闻名的地主庄园。在大清光绪年间曾住过“双千顷”(20万亩),在解放前,土地占有面积居全国地主庄园之首,号称“马走百里不吃人家草”,其政治势力仅次于四川大邑县刘文彩。李氏家族从大清咸丰初年(公元1851年)开始发迹,至民国38年,历经四世,雄霸一方,长达百有年之久,以四川大邑县刘文彩、河南巩义县康百万、山东栖霞县牟二鬼(牟墨林)等庄园一起被称为全国四大地主庄园。李家圩也被定性为晚清至民国时期霍邱县地方最大的封建势力。

李家圩,主要代表建筑包括李家西圩和李家东圩(又称双圩子,有的地图上标注为双围子),在周边不远处马店镇境内。与其布局相似但空间稍小,由李氏家族祖居的还有李家老圩(李西圩村老圩院)、李家大圩院(马店镇马井村)、李家小腰圩(李西圩村老圩院)、李家油坊(张井村油坊院)等,在绿水青山之间,星罗棋布,鸡犬相闻,相互犄角,彼此拱卫,构成别具特色的皖北民居风光。

现在,这些圩子中只有李家西圩的建筑尚存一小部分(现在被命名为李氏庄园),其余均已有名无圩了。

李西圩始建于咸丰中期,用时十年,呈正方形,边长231米,占地80余亩,初建时房屋430多间,建筑具有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区圩寨式风格,前后两道圩,深濠环绕,圩墙坚固,炮楼高耸,吊桥悬挂。

对简单而实用。

二道圩主要用于圩主家庭成员生活起居、办公会客、学习娱乐等,西院西四门内特建有“圣旨楼”,建筑工艺精美复杂,都是歇梁起架,重梁木椽,门楼屋顶有五脊六兽,正中间有铁打的老鹰展翅俯冲(据说置于西院二道圩头道门楼正顶上,寓意武居西,扬威;还寓意本庄园属于“卯”地,《地理五诀》中说:卯地易耕,雄鹰镇之)。建筑内的撑枋、扯枋、抱鼓石、碾墩等,采用大量的木雕、石雕、砖雕工艺,图案有龙、鹿、狮、鳌、鱼、蝙蝠、鸳鸯等动物,以及梅、兰、竹、菊、松、柏等植物,还有“和合二仙”“八仙过海”“二十四孝”等戏剧人物。门上对联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飞龙凤舞”“凡事但求过得去,此心必须放平来”等内容,扯枋上用篆体刻有“天保九如”(出自《诗经·小雅》),门楣及照壁上砖雕“行恒”(出自《周易·六十四卦》)、“素履”(出自《周易·六十四卦·三十七卦》)、“知命乐天”(出自《周易·系辞上》)、“天荷仙府”等字样。

据说,圩子的选址也非常考究,遵循“靠山出人,近水出财,金银都归洼处来”的观念,定在青山环抱、绿水环绕的平畈中央,背靠银珠山,面对马鞍山,东傍猴山、长山,西倚煤山,且有东北方向的泉水堰,东南方向的煤山堰汇入圩前,再向西流北入泉河(原《县志》中记两水绕马鞍山流入城西湖为误),按风水说此处为“藏龙卧虎”之地。民间传说,此圩建在天的中心,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五午夜,在此立竿无影。古人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过去,每逢此日,亲朋好友、达官显贵来此圩“月当头”的大有人在,热闹非凡!

圩子外不远处,南方建有三座花果园,主要种植梨、枣、柿等;圩东南方不远处建有仓库一座,房屋百间,后改建为陇西小学;圩东侧,另建有一处小圩,建有酒坊、油坊、粉坊、糖坊,最前方有商店,最后方建有猪圈;圩后留有近75亩地专种烟叶,并建有烤制烟叶的烟楼;加之圩内织房、磨房等,圩内生活完全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另在圩子稍远处,南方马鞍山余脉处(现址为安阳山烈士陵园)建有规模宏大的李氏宗祠,一座气势雄伟的功德牌坊,另东北方不远处建有家庙龙王庙。

李西圩,是具有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军事防御功能为特色的圩寨堡垒式建筑,无处不显示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近代史上皖北地区劳动人民汗水和智慧结晶,更是历史留给霍邱人民的宝贵遗产!

无独有偶,李东圩距李西圩东一公里处,占地30余亩,于民国3年始建,双圩沟、双圩墙、双吊桥,独门入圩,圩四周围立碉堡,前后六层房,四道院,内有堂楼、客厅、书房、柜房、腰屋、花园等,屋内一律西式陈设。由于此圩建设相对较晚,其坚固程度和防御功能更加完善,完全是一座军事堡垒。可惜的是此圩毁于民国37年战火。



整体布局大致是一寨分三宅,一幢四楼院,头门至最后的堂楼一线串珠,五排房,窄高过一幢,门庭深似海,一门一道关。

头道圩的房屋及场地,主要用于保圩的庄丁值班住宿、骡马厩、长工房、习武训练等,同时用于春秋两季收租时粮食的储存及晾晒等,工艺相



与李家圩建筑风格和功能相似的,霍邱县境内还有如马店刘家(刘洋)楼、白面徐老楼(李特故居)、洪集裴家(裴国华)楼、新店裴家(裴伯谦)圩子等,皖北地区如肥西刘家(刘铭传)老圩、凤台苗家(苗沛霖)圩子等。

鉴于圩寨建筑的风格,有的学者认为属于晋派。

在霍邱县境内残存的与其相似部分古建中,有县城内的文庙、城隍庙,以及临水集境内的圆觉寺、孟集镇境内的陈塔寺、冯井镇内徐老楼、三流集境内的李老楼部分建筑。整体外观古朴素洁,坚固实用,具有包括江淮分水岭地区在内皖北民居共性。究其原因,与当地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民俗民风等均有关。



霍邱地处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秦岭—淮河一线,四季分明,冬冷夏热,这样在建筑选材上多以保温效果较好的砖头石块土坯等为主,区别于南方建筑材料多以木竹。同时,淮河两岸自古以来,是北方政权南下及南方政权北上之必争之地,民风彪悍,战争频发,加之水旱灾害等许多因素,导致建筑相对落后。特别是到了元末明初,两淮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可谓是一片赤地,一片凄凉。大明王朝不得不从国内人口相对富集地区大量移民,以恢复当地的政治经济秩序。移民主要集结地就有位于山东兖州枣林岗和山西洪桐大槐树等北方各地。这些移民是现在两淮地区的主要先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同时也带来了原住地包括建筑艺术在内的文明,落地生根并蓬勃发展。据《李鸿祺乡内试硃卷》中记,李家圩始祖李应光于明初洪武二年由山东迁居。故李家圩的建筑风格与山西、山东等北方地区有相似之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非要对其定性为哪个派别不可,笔者认为“皖北民居”更符合实地情况。

这种圩寨式庄园,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商代,庄园就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结构,在黄淮流域分布就十分密集。到了周代,随着井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到后期,土地私有制成为普遍形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封建地主的封邑内,以生产和生活及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庄园,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庄园的土地来源有几种:一是通过军功或其他原因获得国家授田、赐田;二是继承父祖辈遗留的土地;三是通过土地买卖获得土地,四是强取豪夺公私土地。